

# 泽州县碧落寺石窟调查简报

□ 于飞

碧落寺位于山西省晋城市西北 8 公里的泽州县巴公镇南连氏村东,东边紧邻南牛线公路,从北朝历经数代,香火鼎盛,信徒云集,是享誉中华的一代名刹,曾位居古泽州四大名寺之首。作为古代泽州地区创建最早、影响最大、声名最为显赫的佛教寺院,碧落寺亦是泽州古代八景之首“碧落卧云”的所在地。整个寺院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其背对碧落山,面对万松岭,两座精美绝伦的明代古桥将整个寺院分为南北两院。据寺内摩崖题刻记载,其最早创建于“北魏太和六年”(482 年),起初规模较小,号称“圣佛院”。后历经隋唐发展日益鼎盛,院落不断扩大,更名为“碧落寺”。北宋时期宋英宗钦赐其名为“治平院”,元至元五年(1268 年)重新更名为“碧落寺”至今。2006 年 5 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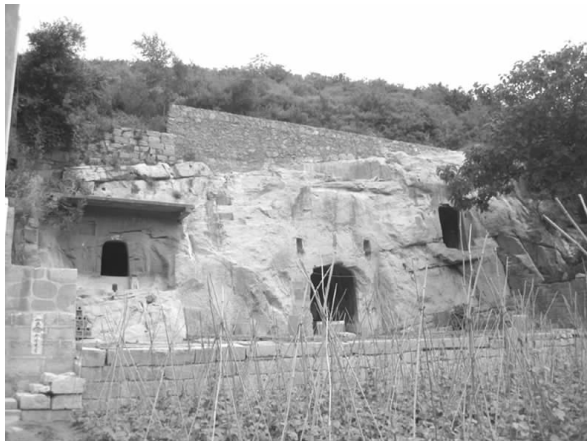
## 一、碧落寺石窟基本情况及现状

碧落寺石窟位于寺北院佛阁东部的山崖之上,距地表 7~10 米,整个窟群长约 22 米。现有洞窟 3 个,小型石龕 64 个,各类大小雕像共 102 尊,佛像、菩萨、侍者、力士、供养人等一应俱全

(图一)。经风雨侵蚀和历代人为破坏,尤其是民国时期孙殿英部的大肆劫掠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破坏,洞窟内各类雕像损毁严重,令人痛惜。近年,各级政府加大了文物保护资金投入,碧落寺的古建得以修缮,石窟建筑也得到了有效保护。

## 二、洞窟调查内容

第一窟:又称“五龙洞”,位于石窟群最西端,俗称“西窟”(图二)。窟门为拱券状,门高 113.8 厘米,宽为 81.2 厘米,券门上方有北宋崇宁五年(1098 年)沙门永庆所作《重建治平院记》,残损严重,只有半数字迹可识。门前左右各雕刻有一力士,现残存不全,只有凿印模糊可见,其通高约为 77.5 厘米,肩宽为 29.1 厘米。力士下方各蹲有石狮,雕琢古朴,气势威严。石狮高约 55.3 厘米,宽约 26.5 厘米,现仅存左边一只,嘴部上方残缺。洞窟外西边台阶旁有题记,字体模糊残缺,内容大致为“寺本是□太和六年造至/唐太和六年三百五十年/僧道弘再/修此寺故刊记/□□正白君亮”。窟洞门外西侧有一“大齐武



图一 碧落寺石窟正面



图二 五龙洞主佛及弟子



图三 五龙洞东壁佛像及弟子

平七年”的摩崖题刻,这也是碧落寺所发现的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题记。“大齐武平”为南北朝时期北齐高纬的年号,“武平七年”为公元576年,岁次丙申。以上诸多证物可确凿无误地推断出,此窟为北朝遗物。窟内面积较小,洞窟高201厘米,长213.8厘米,宽207厘米。窟顶有莲花装宝盖,因长期雨水侵蚀,损毁严重且呈砖红色,从仅存的部分及印记测出其直径为120厘米左右,中间为圆形,周围两层莲花装饰。

1. 洞中正北为一主佛二侍者二菩萨,主佛圆脸阔耳,脖子粗圆,面带慈笑,形体敦厚,内着僧祇支,外穿通肩式袈裟,身后有火焰形背光,结跏趺坐于石台之上,左手朝上,右手紧托左手置于双腿之上,其高93.2厘米,肩宽53厘米。左右笔直站立二侍者,二者通高73厘米,肩宽19厘米,均有圆形头光,脚板丰厚。左边侍者头部残缺,左手弯曲横置于胸前,右手自然弯曲下垂于肚脐部位,身着袈裟纹理清晰。右边侍者头部完整,弯眉圆脸,神态自然,双手通袖于胸前。左右菩萨分立侍者两边,左边菩萨神态、发髻、衣着同主佛如出一辙,通袖而立;右边菩萨头部残缺,双手合十,形态装扮亦同左边形似。

2. 洞中西壁下有一佛二弟子面东而坐(立),作听法状,佛像结跏趺坐,做禅定印,高90厘米,高发髻,圆脸阔耳,身体浑圆,形态同主佛似。两弟子均有桃形头光,身着长裙,左弟子头部十指紧扣置于胸前,右弟子头部残缺,右手执宝物,左手托底,二者均赤脚直立。

3. 洞中东壁下亦有一佛二弟子面西而坐



图四 五龙洞内壁北朝线刻画及题记

(立),于西壁佛像呈左右对称(图三)。佛像结跏趺坐,发髻与正佛、西佛明显不同,舟形背光,头部为卷发,周边以宝珠装饰,右手自然弯曲向下放置于右腿上,左手手掌向上,四指弯曲放于左腿,衣衫自然下落形成褶皱,袖口处纹理清晰。左右弟子均有桃形头光,头饰、衣着较西壁弟子有明显不同。右弟子头戴印度式的“珠宝帽”,面部圆润,颈部戴桃形项圈,身着垂地长裙,裙褶飘逸,富有极强的动感,右手弯曲向上放于右肋,左手紧握一香囊。左弟子面部、手部均损毁严重,但残存衣帛纹理同右弟子相同,尤其是右肘部处有一宝瓶,雕琢精美,小巧玲珑。二者均赤脚踏于圆台之上。

#### 4. 石龛及线刻画:

西窟内共有小型佛龛49个,内置各类佛像、侍者、弟子共计53个。分置于洞窟内的四角墙壁之上,石龛大小形制基本相同,高为15.2厘米,宽为10.8厘米,每个小龛内均雕刻有一小佛,结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之上,面部均已模糊难辨,据析应为听法弟子。具体分布如下:西南角上方有佛龛8个;西北角有两层,每层10个,两层下方纵向排列两尊小佛;东北角佛龛横向排列有10个,其左下方有一长方形小龛,宽23厘米,高15厘米,内雕有一佛二侍者二弟子,小佛结跏趺坐束腰莲花台上。旁边小龛内立有一护法力士,下有唐文明元年(684年)造像题记;东南角有小龛8个。小龛的开凿多为隋唐之作,破坏了原先内壁的诸多前朝线刻及题记,令人惋惜。

在整个西窟的内壁上,在各类佛像的空隙之



图五 摸光洞主佛及弟子



图六 摸光洞东壁菩萨及天王

处,到处刻有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供养人的题名及线刻画像,其中绝大多数为北朝遗物。题名多为“有像主王显与妻李、邑子韩开国、比丘僧明静等”,线刻人物多头梳高髻,细眼弯眉,身穿羊肠纹裙,袒膊露臂,脚蹬高靴,手中持有莲花或蕉叶,妻友或侍从伴其左右,步态闲雅,突出地体现了北朝时期鲜卑族的服饰特点(图四)。初略统计整个画像中有供养人题名 80 余处,其中有像主 21 人,大都邑主 6 人,邑主 1 人,教化主 2 人,都维那 5 人,维那 4 人,邑子 44 人,其他为比丘尼和比丘僧等。

第二窟:又称“摸光洞”,位于整个石窟群的最东端,俗称“东窟”(图五)。距地表 3~4 米,循砖砌台阶转弯而上。窟门为长方形,高 205 厘米,宽 147.8 厘米,门楣处有摩崖石刻,字迹难辨。窟内长 210 厘米,宽 235 厘米,高 232 厘米。此窟共有造像 7 尊,为一佛二侍者二菩萨二天王。

1. 窟内正北有一佛,高 183 厘米,肩宽 53.7 厘米,头部手部均残缺,从手臂的姿势可看出施无畏印。头部墙壁上有精美的火焰形头光,内有两层圆圈,中间为荷花瓣装饰。佛像结跏趺坐于八边形须弥座之上,须弥座高 27.8 厘米,宽 81.5 厘米,座下有圆形莲台。其体态丰腴,内着僧祇支,束腰带打结于胸前,衣纹流畅,自然舒展,下身衣褶悬挂于座前四周。

2. 正佛左右各有一侍者,身材较矮,头部均残缺,圆形头光依稀可见。左侍者高约 112.7 厘米,身披衣帛,衣带下垂,双手捧一法器。右边侍者略高于左侍者,高约 127.3 厘米,脖颈处有环形璎珞,双手合十,右边衣角斜搭于左手臂,衣着纹络形成弧线,二侍者均跏趺于圆形莲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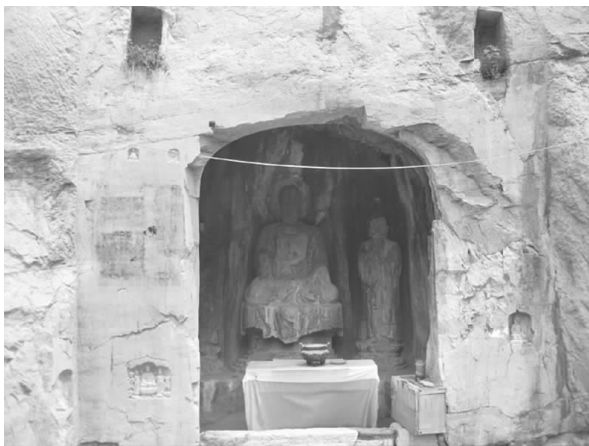
3. 东西壁前各立有一菩萨,通高为 160 厘米,均有火焰形头光。西壁菩萨头部及身体右侧手、腿、足均已缺失。左侧手腕戴镯,脖颈戴连珠项圈用璎珞装饰,圆形玉佩穿绳悬于腿前,体型婀娜,衣袖飘飘,彩带飞舞。东壁菩萨像除头部缺失外,整体保存较完好,火焰形头光,身披锦帛,下着长裙,脖颈戴三层连珠项链,璎珞装饰,手腕戴镯,右手拇指、食指、中指轻握飘带,左手臂弯曲于胸前,手指轻捻一朵莲花。左腿直立,右腿稍外弯曲,跏趺立于莲台上,整个造像柔美婀娜(图六)。

4. 在东西壁菩萨像两侧各有一护法天王,均



图七 常山李弘太和七年题记





图八 老佛洞正面及题记



图一〇 老佛洞唐代主佛及弟子



图九 老佛洞窟门唐代篆书题记

遭严重破坏,东壁天王残存模糊可辨其手持金刚杵,其脚踩一夜叉,从残存印记估测高约为122.6厘米,肩宽36.4厘米。

5. 西壁菩萨与天王之间墙壁上有石刻共计9字,字迹为“常山李弘大和七年记”,大和又称太和,为晚唐时期唐文宗李昂的年号,太和七年为公元833年(图七);东壁天王右上方有题字十余字,字迹模糊为“□□□□□至此,陈静来”;洞窟外东壁之上有“甲子仲□五日□□□刘璟……青山来天球□宗元”的游玩题记。此洞窟内的造像相对于盛唐时期的雍容华贵、衣袂飘扬,体态丰肥,气势恢宏相比的夸张手法,整体造像风格较内敛,衣带帔帛相对朴素,写实风格也更为突

出,再加上太和七年(833年)题记的有力佐证,初步可推断为晚唐时期的雕刻作品。

第三窟,又称“老佛洞”,位于整个石窟群的正中间部位,俗称“中窟”(图八)。窟门呈“n”字形,面南而开,窟门上斧痕凿凿,左右上角现有小龕两处,距地表约为2.7米,为高宗李治和武周时期所造,龕内佛像现已不存。洞窟外东壁基本被凿毁大部,只剩上方17字游碧落寺题记一则。其他有武周“大周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和唐懿宗“咸通十年(870年)”的石刻各一处。西壁则有“大周万岁登封元年(695年)”和开成七年李道夷《秋游石佛谷诗》等。洞窟以东两米处有明嘉靖《舜泽张伯纯先生挽诗》石刻一通。洞窟门高223厘米,宽198厘米,门壁厚27厘米,东侧上有唐代篆书一则,字体枯润有致,凝重苍古,内容似为祈福(图九)。窟内高357厘米,宽351厘米,长282厘米。此窟共有雕像7尊,为一佛二侍者二菩萨二天王。

1. 主佛高186厘米,头部残,火焰形头光,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愿印,结跏趺坐于束腰式八角形须弥座上,下为莲花台。其双肩宽厚,体态丰满,内着僧祇支,外披通肩式袈裟,面料轻柔细腻,自然垂落于须弥座四周(图一〇)。主佛左右各有侍者,通高为163厘米,头部均残缺,圆形头光,跏趺直立于束腰莲花台上。左侍者双手抱拳,应为迦叶;右侍者损毁严重,仅有右手置于胸前作合十状,应为阿难。

2. 东西壁各有一菩萨,损毁程度不一。通高



图一—老佛洞西壁菩萨

168 厘米,精美的火焰轮头光,均跣足立于束腰莲花台上。东壁菩萨几乎全部不存,仅剩头光、脚部和莲花台可见。西壁菩萨仅头部和右肘部残,脖戴连珠项圈,帔帛斜挂,下穿罗裙,腰部有束带,服饰细腻华美,璎珞小巧精致,衣服轻薄透体,纹线流畅自然,披巾层次感明显。体态丰腴,腰肢扭动,身体呈 S 型,动感强烈(图一)。

3. 东西壁菩萨外侧各有一护法天王。通高 172 厘米,身着铠甲,圆形头光,四肢孔武有力,身材短矮粗壮。东壁天王头部、右肘、左手残,右手持金刚杵扛于右肩,左手臂紧搂一兵器,高靴左右各踏夜叉,夜叉四肢翻滚,作惊恐挣扎状(图一二)。西壁天王头部、兵器残,左手五指闭合手掌外推,右手执兵器下指脚下夜叉。

“老佛洞”的整体造像风格与“摸光洞”相似,但又有所不同。首先衣饰上更加富丽繁多,线条更加流畅飘逸,人物更加丰满,与摸光洞造像的相对内敛的世俗化风格相比,更加浪漫唯美,追求无拘无束的自由洒脱。其次,洞窟外壁武周“通天二年”和高宗时期的小龕内有隶书和楷书题记,中间夹杂有武氏新字更加明确了其为唐朝初期作品。第三,此窟的开凿修建与“碧落碑”有密切联系。清修《山西通志》记载:“绛泽二州皆有韩王元嘉子黄公为妣妃荐福作文立石。文虽不同,皆名碧落,在绛者刻于天尊之背,在泽者刻于佛



图一二 老佛洞东壁天王

龕之西。”韩王元嘉,唐高祖第十一子,贞观六年封潞州刺史,高宗时转泽州刺史,武后临朝授其为太尉,后与其子通州刺史黄公李撰及越王李贞起兵倒武,兵败被诛。黄公李撰,元嘉第三子,少以文采见之。唐高宗永淳二年(683 年),李撰在泽州碧落寺为母造弥勒像及摩崖篆碑。金代泽州刺史、后任汾阳节度使的许安仁在《碧落寺摩崖碑记》中著曰:“撰为妣妃作弥勒于泽,天尊于绛,各文之以碑,词异篆同”。此处所指篆碑就是千古唐碑泽州“碧落碑”,后毁于金元战火。由此可见,此窟窟门内壁上的篆书内容极有可能与“碧落碑”有关,同为黄公为母祈福之词,而所造弥勒像正指的是此窟中佛像的开凿。由此可见,此窟为唐代初期高宗、武周时期的造像精品。

### 三、结 语

泽州碧落寺石窟群的开凿先后顺序为五龙洞—老佛洞—摸光洞,造像的风格也由北齐时期面容圆润,体态安详深邃,线条简洁流畅,附之以简洁的线刻,造型单一的手法逐渐转向唐朝神态雄伟大气、衣着华丽细致、表情细腻深沉,袈裟贴体透肌的风格转变。尤其是菩萨身躯一改往日跣足直立为“S”型,柔美多姿,将庄重与贴切、理想与现实、佛性与人性高度的统一。这些变化深刻

(下转 16 页)

锡料的来源区域作出准确判断。但是根据现有数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西周时期晋南地区青铜铸造所用锡料均应来源于同一地区。

## 五、结论

1. 横水西周墓地青铜器中所含的矿石铅多数都在普通铅范围内,仅一件器物含高放射成因铅。

2. 横水西周墓地、天马曲村遗址及大河口西周墓地青铜器中所含的矿石铅均具有相似或接近的铅同位素比值特征。可见,这些青铜器铸造时使用了同一矿区,甚至相同矿山的金属原料。此外,其锡器也具有相同或相似的铅同位素比值特征,说明锡料的来源也应基本相同。

附记:本项研究受到山西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农业与社会发展)20100312040 专项资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田建花博士给予了实验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1] 金正耀等《广汉三星堆遗物坑青铜器的化学组成和铅同位素比值研究》,《文物》1995年第2期,80页。

[2] 金正耀《中国铅同位素考古》,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8年,176页。

[3] 金正耀《铅同位素示踪方法应用于考古研究的进展》,《地球学报》2003年第6期,548页。

[4] a. 山西省考古所、运城文物工作站、绛县文化局《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考古》2006年第7期,18页;  
b. 国家文物局《2005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72页。

[5] 国家文物局《2006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56~59页。

[6] 金正耀等《天马-曲村遗址西周墓地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见《天马-曲村(1980-1989)》第三册附录五,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1176页。

[7] 金正耀《铅同位素示踪方法应用于考古研究的进展》,《地球学报》2003年第6期,548页。

[8] 金正耀等《天马-曲村遗址西周墓地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见《天马-曲村(1980-1989)》第三册附录五,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1174~1175页;杨颖亮《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显微结构和铅同位素比值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46页。

[9] 彭子成等《鱼国墓地金属器物铅同位素比值测定》,见《宝鸡鱼国墓地》(附录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641页。

[10] 金正耀等《天马-曲村遗址西周墓地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见《天马-曲村(1980-1989)》第三册附录五,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1174~1175页。

(作者工作单位:南普恒,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马江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上接49页)

折射出当时社会由北朝分裂动荡走向隋唐统一昌盛的社会背景下,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普通百姓对稳定繁荣生活的期望,同时也为研究泽州地区佛教石窟艺术从北朝到隋唐的风格转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

碧落寺地处中国社会政治的中心地带,历经一千五百余年的风雨侵袭和朝代更迭,无数文物精品在岁月和战争中被劫掠损毁,令人惋惜不已。幸运的是,近年各级政府和部门加大了对碧落寺及石窟的资金投入和看管力度,1999年重刊了千古篆碑“碧落碑”,并先后修复观音阁、毗卢殿等古建筑群。作为一个文物工作者,我们理应勇担重责,尽全力保护好祖宗留下来的这片宝

贵资源,把更多的历史文化遗产留给子孙后代,将中华文明的火种继续传承下去。

## 参考书目

1. 《碧落禅定》,1999年10月1日《古文化学报》。
2. 《凤台县志》寺观卷,1983年翻印。
3. 张怀记《中国佛教石窟造像题材的演变》,《美与时代(上半月)》,2008年第4期。
4. 王笃生《略谈我国传统佛像风格的演变》,《浙江工艺美术》,2009年12月。
5. 贺玉萍《水泉石窟造像艺术分析》,《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08年12月。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晋城博物馆)